

豫村里的中国

——豫村调查：
追寻中国基层乡村基本问题

蒋伟涛 著



豫村里的中国

——豫村调查：追寻中国基层乡村基本问题

蒋伟涛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豫村里的中国：豫村调查：追寻中国基层乡村基本问题 / 蒋伟涛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 7
ISBN 978 - 7 - 5047 - 5279 - 6

I. ①豫… II. ①蒋… III. ①农业经济—调查研究—河南省 ②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河南省 ③农民问题—调查研究—河南省 IV. ①F327. 61②D422. 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012 号

策划编辑 寇俊玲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编辑 杨银旗 李瑞清

责任校对 梁 凡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279 - 6/F · 2190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0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在新的视角下推进“三农”问题的研究 （代序）

“三农”问题最初是由温铁军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温铁军看来，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包括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双重制约下，土地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体现出的是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大多数传统农区的非正式制度、非规范契约至今仍然是维系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三农”问题这个概念在20世纪末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今天已经被政策界和社会各界广泛接受。所谓“三农”问题，与传统农业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差别，在于突出了农民问题，并把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引入了对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思考，深化了我们对乡土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境况的认识。

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直较为偏狭。尽管这些理解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学的视野，但还是将“三农”问题归入所谓经济基础的问题。比如，温铁军就明确表示“三农”问题与他后来提出的属于上层建筑的“三治问题”（村治、乡治与县治）是不同的。学界在阐释这个概念时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模糊地放在一起，很少真正厘清这三个问题的内在关联，很少用其他两个问题来理解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今天已经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三农”问题，也就是把土地看作农业问题的核心问题，把治理看作农村问题的实质问题，把民情看作农民问题的基础问题。这种理解看似简单，实际上，它不仅把温铁军所说的“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融为一体，而且还把以往研究者都忽略的民情问题纳入了视野中。“三农”问题中的这三个问题不是含混并立的，而是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只有联系治理和民情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土地

问题；同样的，我们只有联系土地和民情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农村治理问题；我们也只有联系土地和治理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村庄民情问题。通过“土地—治理—民情”这三重分析框架，我们一方面可以概要地理解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的种种制度创举，比如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的推行，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农村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如何面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张力问题，如何谨慎处理土地资本化的问题，如何再造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如何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的问题，如何克服农民的原子化状态，以及如何巩固家庭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等等。^①

蒋伟涛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也是我去法大任教后教过的第一批学生。当年他在校学习时，他对“三农”问题高度的热情和认真的求知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毕业近十年来，伟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问题。现在面世的这部著作就是他积多年苦功结出的硕果。我欣喜地看到，伟涛对他故乡的这部调查作品尽管并没有完全按照我所理解的新“三农”问题的框架去展开，但由于他社会学基本功扎实，多年来又一直自觉追踪学术前沿，所以，他在书中给我们讲述的诸多故事都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三农”问题。我也很愿意将此作品推荐给所有关心“三农”问题的读者，与伟涛一起经历、发问和探寻。

应星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2014年3月15日

^① 应星，“三农”问题新释——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三重分析框架[J]，人文杂志，2014（1）。

我的“三农”心路历程

一、本书写作缘起

“农民、农村、农业”这是三个分不开理还乱的概念，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提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就没有国家的小康社会”，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最大问题，在城市人眼里这是落后与贫穷的代名词，在农村人眼里这是一辈辈的归宿和命运。曾几何时，“三农”问题走出了专家学者的书斋和枯燥的论文，成为大众媒体广而宣之的一个名词，成为各级政府绞尽脑汁的问题事件，同时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

我们很庆幸，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可以自由话语的时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住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难题，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社会等各项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以下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居世界第2位，比上年增长7.8%。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3116亿美元，比上年年末增加1304亿美元。全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35亿元，增长12.8%；其中税收收入100601亿元，增加10862亿元，增长12.1%。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127万公顷，比上年增长69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470万公顷，减少34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398万公顷，增加12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203万公顷，增加9万公顷。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12年的70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上年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43 元提高到 2012 年的 21986 元。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39.3%，城镇为 36.2%。此外，我国在载人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高新科技领域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建设事业同样实现了显著的进步。绝对贫困人口从 2.5 亿减少到 2300 万；农村人口比重从占 80% 以上下降到现在大约 50%，平均每年 1000 多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此外，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看到这些成绩和喜人数据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村医疗改革、农村养老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村环境污染等问题，以至于中央多个文件多次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乡镇书记上书总理《我向总理说实话》，讲述三农问题的危害性；有学者深入农村数十载，亲身体验农村的疾苦，深入村民家中探访不公正之事，写出《农村调查报告》；有学者致力于农村的改造，组建三农支教调查队，筹划期刊《中国改革·农村版》，为农村、农民、农业减负和发展奔走疾呼；也有的人在从事“三农”的道路上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三农”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新问题，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感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沉痛。“三农”问题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需要所有人关注和思考。您或许不是农民，翻翻您祖上的族谱，或许不出三到五代，您家也是农民，请您关心农民、关心农村、关心农业，不要歧视“三农”问题。农村生活的艰辛程度，绝非城市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农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绝非城市人所能够体会得到的；农村的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够解决的。每每在街头看见露宿地下通道的乞丐和成群的农民工，每每在报刊媒体上看到城里人对农民的冷嘲热讽，每每看到公交地铁对农民工的歧视眼神，每每在夜里梦到故乡的父老乡亲，每每想到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于温饱边缘，我的心都禁不住颤抖！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致富问题，是农村的繁荣问题，是农业的发展问题！

据媒体最近对全国各地癌症村的调查，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唯 GDP”模式下，各地招商引资上马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小城镇化下的乱占耕地、拆迁等问题，这些都造成一些农村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也许一些城里人觉得这和自己离得很远，殊不知农村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与每一个城市人息息相关。比如媒体报道的山东潍坊、寿光等中小企业向水井中排放污水事件，直接会通过地下水和土壤污染作为“中国蔬菜之乡”的蔬菜，谁敢保证自己餐桌上的蔬菜都是绿色的？近段时间北京的雾霾不只是北京独有的，放眼整个华北东部基本上都被雾霾覆盖，到底是城市污染着农村，还是农村污染着城市，说也说不清楚。在这里城市和农村已经形成了闭合的网络，谁也别想说谁能离开谁，谁能不影响谁。

回望 2012 年的龙年，“三农”发展让人陶醉。粮食产量“九连增”，农民收入“九连快”，“三农”发展不断攀上新高。全年粮食产量 11791 亿斤，连续五年稳定在 10500 亿斤以上，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全年农民收入 7917 元，连续三年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标志着农民的幸福生活再迈新步伐。可以说“三农”好事好，喜事多。农业农村好形势，映照着“三农”发展的黄金期，但是这些数据依旧映照着“三农”发展难以掩饰的纠结。农业依然弱，农村依然难，农民依然不够富。从产业比较上看，农业是弱质产业；从区域经济上看，农村是发展的薄弱地区；从公共政策上看，农民享受的公共政策阳光还远远不够；从收入分配上看，农民收入水平从整体上还是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历史发展中充斥着无数的偶然因素。“蝴蝶效应”比喻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就可能在得克萨斯引起一阵龙卷风，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气象、金融股票领域。历史上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即使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也可能在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对历史长期变迁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影响其作用是正负皆有。既可能是由于偶然因素，事物进入到发展路径中的分岔节点，因结构化的路径锁定作用而长期徘徊不前，难以跃迁；也可能是先前的既定选择在潜移默化地奠定、推动着事物新的发展，起到正向积极的作用。对于后者叫“滑道效应”。就如同飞机在起飞上天前需要在陆地跑道上做一段时间的滑行助力起飞准备，“滑道”所起的作用就是为飞机升空积累动

能。至于飞机上天后，又会因新的因素，如航向、风速、云量等重新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目前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梦”的关键症结，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腿，处理不好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局。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飞机飞行“滑道”，“滑道”犹如“三农”问题，之前助力发展如同农业对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飞机上了天空，它不能只顾得上自己往上飞，还需要关注地下的“跑道”，不然的话就只能永远在天上飞，因为地下的“跑道”不想让它降落了。

目前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体推波助澜的报道。但是中国之大，问题之多，不是媒体的报道视野所能囊括的，媒体只是选择一些典型的、影响恶劣的个案进行报道。研究三农问题需要做一个有心人，因为现在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案例被媒体报道出来，被学者论文提出来，这些问题都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常态性地存在着。对于很多个案，在网上搜索会发现很多以前类似的报道。正如有媒体评论，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痛感，需要一些极端个案的刺激，但是很多问题还没有积累到极端个案的程度，大家都熟视无睹的话，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后，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然后又是集中报道，又是表态防治，又是运动式执法，又是扎堆式反思，不久之后，又会集体健忘，又是新一轮的集体无意识，又等着下一次极端个案爆发后再集体震惊，再集体讨伐，再集体遗忘。面对诸多的“三农”问题，利用专业知识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一个小小的乡村要想揭示出所有的问题症结所在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作者还是秉承“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在自己力所能及之余写一些对农村的感悟，追寻自己内心的平衡。有学者说目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坐而论道”，笔者深知实践的意义，但是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参与到农村发展的大潮中，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笔者深感欣慰的是在这一道路上有很多的志同道合者，愿此书提出的问题和相关政策意见建议能够引起关注，只此一点，本书价值足矣。

二、本书写作方法

（一）社区研究的路径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不是全面的。中国很大，每个城市、每个地区、每个村落都有其特点，所以研究起来都不能盲目武断地说自己是全面的，应该说有一定代表性是可行的。但是每个城市、村落以及每一个受访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都能反映出中国现状的一部分，他可以不具有代表性，但

是他的不合理之处和现状也是需要改变的。当你努力去做了，当我努力去做了，当大家都努力去做了，这样一个个零碎的局部现状再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中国现状的大致全貌。这样的研究方法可称为“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方法。

在一些问题上，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需要有一定的理论预设和假定理论，所有的调研按照预设进行，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以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思维，虽然没有研究题目、没有研究结构，也没有研究假设，而是依据生活于其中若干年的体悟观察，在系统的访谈中把故事展现出来，然后再把故事反映的问题提取出来，逐渐进行分类和归纳，最后形成一定的结构和篇章。对于本书来说，笔者就是遵循以上的路径方法开展调研的。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同时他还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是米尔斯所定义的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①

关于社会学研究农村的对象选取范围大小早先就有争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在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的系统化学说，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研究社会，由此开始了社会学研究中国社区学派的滥觞。英国学者雷蒙德·弗思博士认为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应当“以一个村子作研究中心来考察村民们相互间的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关系、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②。

费孝通先生早年研究江南一个村庄并身体力行撰写《江村经济》，他认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但费老同时也认识到“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

① 郭于华. 倾听底层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② 费孝通. 江村经济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的最好方法”。^①“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有三：第一，“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第二，“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验调查的场地”。第三，“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②

社区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研究单位的空间性大小，而不注重研究单位的时间性长短。按照空间时间两分法的研究路径，需要对社区研究按照时间和地点这两条轴线让自己在中国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下定位研究工作。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点”进入的方式，对某一关注的问题按照事件、过程和含义提供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和解析，此方法可谓是研究“时间上的短暂性，只是对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匆匆一瞥”^③。如果只是就某一问题采取“点”进入的方式，只关注“当下”事件的研究，即使抽丝剥茧，也不足以把事件、问题的发展历程、来龙去脉、存在合理性、制度变迁等说清楚。按照整体论和制度分析学的观点，农村每一问题都不是单一的社会问题，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发展的结果，有学者在研究村庄选举时分析道：“首先，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其演变路径并不总是持续的，也不遵循线性趋势或单调上升趋势。如果研究者沿着这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时点插入进去做调查研究，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经验和结论。其次，制度变迁常常涉及多重的过程，这些过程常常是相互独立的，有着其自身的演化节奏……但这些过程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上的互动却可能产生相应的制度条件……换言之，导致村庄选举制度变化的深层原因常常不是来自选举领域，而是那些发生于其他的、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中的更大过程。因此，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关注那些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各种事件和广阔背景，就很难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和渊源。这意味着，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提出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同①。

③ 周雪光：《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J]，社会，2009（3）。

有力的解释，需要采用那些可以捕捉多重过程间互动演变动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①

本书尝试把农村若干问题在一个村域进行详细考察，对其各方面问题按照事件历程的方式展示出来，让影响农村诸问题的各因素互相呈现到具体的案例中，展现出相互影响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出主次矛盾来，为提出对策提供基础支撑。

（二）个案研究的意义

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而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②这种质疑显然并非单单限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之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研究，或者说以村落为单位的研究仍然是乡村研究中所重视的考察单元，因为这种研究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③

个案研究的意义不可否认，因为根据国情的要求，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研究对于一些机构组织是可行的，对于一些有志于研究农村问题的单个个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笔者不奢求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理论性的重大突破，而是在自己经验和理论之中寻求一种平衡，可能有的现象已经被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并得出结论来，但是那是他们研究意义上的个案经验。笔者尝试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环境、另外一种境遇情况下的相似性，也可验证已有学者研究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仅此而已就心满意足了。在个案研究之中也要清晰地意识到“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④，这种意识减小了个

① 周雪光，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J]. 社会，2009（3）.

②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③ 狄金华，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 [J]. 中国农村观察，2009（6）.

④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一些政治学者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①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美国学者施坚雅看来，他们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并未能够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所谓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则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的，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②

作者清晰界定了农村、基层市场、中心市场和都市等易混淆的概念，随后他提出了最著名也是最受后来学者非议的六边形市场区域理论。他认为，理想的市场区域是圆形，但是由于受到周边市场区域的挤压并且无重叠和空隙，因此每一个市场区域被挤成了六边形。结合几何学原理和中国经验数据，中国的情况应该是两环 18 个村庄。由于施坚雅提出的模型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数学模型，并非由中国史料甚至欧洲相类似情况推理而出，所以自它被提出之日起至今，一直备受争议。不论争议如何，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与宗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者、政治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对“三农”问题很多学者也有很多的论述，但是限于学术论文的传播范围，大多是学界内进行关注，社会关注不够，与社会不能形成互动。有一些论述笔者可能限于能力和精力限制，是不能看到的，但是作为个案意义上的

① 贺雪峰.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②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研究，也许“英雄所见略同”。中国地大物博的事实，对于研究单位的选择究竟多大，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但是笔者不采取争论或者否定的态度，而是采用发现问题、研究展示、相互对比的方法过程，让读者进行比较，如果感到很多研究者都发现某一问题，那就是共性的问题，是需要加以关注的，以此作为研究的再出发点。诚然，中国的国情是复杂的，很多地方的问题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如果先发现共性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然后再提出对策加以解决，起码可以说先遵循解决共性问题，然后解决个性问题的原则，从而不在争论“问题”存在与否上费工夫。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社会科学“行胜于言”，不论本书代表多大范围的当下农村现状，起码在豫村周边方圆百里是有代表性的，也期待其他同仁能多研究其他地区的“三农”现状，用拼图法把整个中国农村的现状呈现出来。

（三）讲故事的方法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研究方法和应星教授的“讲故事”的方法，孙立平教授在提到研究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时提出：

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和谁远，谁和谁近。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事情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時候，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这启示我们，我们的关注点，也就应当放到这种“有事情的时候”。这种“有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俗语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当中的“打虎”和“上阵”就是可以展示真正父子兄弟关系的事件性过程）。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所谓“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使接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成为可能。^①

关于农村调查研究获取真实性资料的问题是困惑田野调查人员的首要关键问题，学者曹锦清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时，认为一是调查“入场”方法问题，二是如何保护“现场”的问题。曹锦清坦言其

^①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M]//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实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利用政府人员层层介绍进入，二是利用亲戚朋友关系一起进入。曹锦清采取的是利用市县两级党校的同学朋友等关系进入。笔者认为其实还有第三种方式，那就是利用自身生活于“农村场域”之中的优势，这样就需要研究人员既有村民的身份，又有调查研究的意向。笔者所调查的豫村（按照研究惯例，本书中地名和人名都进行了技术处理）就是笔者生活三十年之久的故乡，笔者展示的故事是以居住的故乡村庄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方圆五千米的社会空间，对于其中近三十年的人和事，笔者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这是笔者生于斯、长于斯，前后经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对这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基本上都听说过，有的事件笔者又曾经多方考证过，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于一些事情不会产生震惊，认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说陌生，是因为多年的正规教育的浸染，接受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训练，与传统农村的思维方式、观念等有了迥异的不同，用学术的理论、观念、思维等做对比会产生陌生的感觉。但是笔者也清楚的秉承学术的规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先入为主的影响。

在本书中笔者写了好多人的平凡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喜或悲，大开大合，展现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之人和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想到了郭于华教授在《倾听底层》中的立场：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是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丝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多年来的访谈和研究工作已使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写作的目的一直是笔者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1993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了表现当代社会普通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难》，布迪厄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并由此阐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会上难以言明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要突破各种各样的屏蔽，这些屏蔽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他还动员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和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而正是这些社会机制滋养了

人们的反感、苦恼、绝望。^①

作为在农村里成长起来的80后，对于农村有着太多的感受，每次回家的经历，乡村诸多往事和大量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在深深地刺激着笔者的脑细胞，看着村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辛酸，看着村民苦涩而又乐观的目光，笔者知道他们想过得更好一些，可以更无忧无虑一些，但是现实的种种困境只能让他们自己靠双手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感觉的不公正、不公平和委屈却被生活的艰辛压在肚子里，作为一名走出农门的知识分子，自己给他们该做什么。

想起了多年前学校校庆时师哥看到学校的浪费，写下的“思想的芦苇”一文，多年以后他为了自己家庭的权利不受外来势力欺压奋斗着、战斗着，他的形象在我的内心始终高高在上。我知道我没有勇气剑指锋芒，但是在自己应有的能力范围内把他们的辛苦、酸甜苦辣写出来还是可以做到的。芦苇是豫东大地河道里和低洼地里常见的野草之一，也是《诗经》中描写的最美的植物之一，“蒹葭苍苍，在水一方”，疾风劲吹，它只能根部牢固地抓住大地而身体随之俯仰，但是芦苇依旧有自己的坚韧和倔强，正如那段名言所云：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三、本书内容简介

本书所研究的豫村位于豫东西北部豫镇，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平原地貌，豫镇共有30多个行政村，近200个自然村，人口近6万人，耕地面积7.5万亩。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兼以林业、规模养殖和工业经济为辅，现有镇办企业10余家，村办企业50家，规模养殖场20余家，个体联合体工商户2000家，工业产值1500万元。从经济收入看在全县属于中等偏上的地位。本文的案例是笔者数十年乡村生活中亲身体验并收集的，相关案例笔者又在调查中详细考察过。关于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农村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若干问题的发生无不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系，笔者选择农村经济问题作为第一章，为后面章节分析提供背景资料。这些年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户的税费改革一直是媒体一窝蜂追踪报道的热点问题。随着税费改革的进行，对于农民收入的关注一度无人问津，但是笔者通过调研看到农民收入不是税费改革一公布

^① 郭于华：《倾听底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